

出版书单



《帝都之铁：汉代铁工业与辐辏网络》

林永昌 著

聚焦关中核心区，林永昌教授通过考古遗存、简牍文书与跨文明对比，重构汉代冶铁工业如何以技术革新与官营垄断，编织出一张贯通都城与边疆的“辐辏网络”。



《她手中的柳叶刀》

埃夫丽尔·曼斯菲尔德[英] 著

在20世纪70年代初获得外科医生资格时，她的同事中只有2%是女性。她的故事让我们看到医学界和社会已经发生了不可估量的变化，但正如她通过自己的经历所展示的那样，女性要在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曾经联想》

陈丹青 著

作者以深入的同理心与敏锐的洞察力，记录11位“曾经联想”人的职场浮沉与人生选择。这是一部珍贵的私人史，是联想文化的微观切片，是中国互联网黄金时代的鲜活镜像，是社会奔腾向前的生动缩影。



《荷兰之光：惠更斯家族与欧洲科学的形成》

休·奥尔德西-威廉斯[英] 著

全书以时间为线索，从17世纪荷兰科学家克里斯蒂安的家庭背景、成长环境切入，详细描述了他在天文学、光学、力学、数学等领域作出的突破性贡献，同时穿插其与牛顿、笛卡尔、莱布尼茨等同时代科学家的交流与竞争，展现了科学革命时期的学术氛围与社会背景。



《蒸汽洗衣房：美国 and 英国的性别、技术和工作(1880-1940)》

阿尔文·P·莫恩[美] 著

洗衣房曾一度遍布英美城市街头——它们与钢铁厂、铁路一样，都是同一历史进程的产物。然而不同于那些更为人们熟知的工业化象征，这些“清洁工厂”女工始终与家庭领域紧密相连。作者通过这一视角，探讨了性别如何塑造日常劳动分工、劳动力构成及劳动价值评估等更深层的社会议题。



钟雪平

听惠州市博物馆馆长钟雪平解读“四普”新发现背后的动人故事 千百年后还能与古人“实地对话”，很有成就感！

我在广东找文物

文/羊城晚报记者 周欣怡 朱绍杰 图/受访者提供

2024年，广东省全面铺开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以下简称“四普”)，惠州府衙遗址是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以来新发现的代表性文物线索之一，在“四普”中首次登记存档。

除广州外，这是广东省内其他地方第一次对古代官署建筑进行考古发掘的重大发现。惠州府衙遗址出土的一系列遗迹和文物，为惠州绵延千年的府城文脉提供了实证。

同样令人振奋的是，此次普查还发现了香港大营救相关重要革命遗址——元和寿山世居。在抗战胜利80周年之际，这一发现极具历史意义。

惠州市博物馆馆长、市普查办副主任钟雪平在此次普查过程中，全程参与了上述两处遗址的考察工作，更对它们的文化价值如数家珍。身为此次文物普查专业技术组的组长，他全面协调统筹惠州地区的普查及技术工作，带领团队深入田野，逐个克服技术难关，既与村民促膝长谈，又同专家深入研讨，用专业与坚守诠释着文保人的责任与担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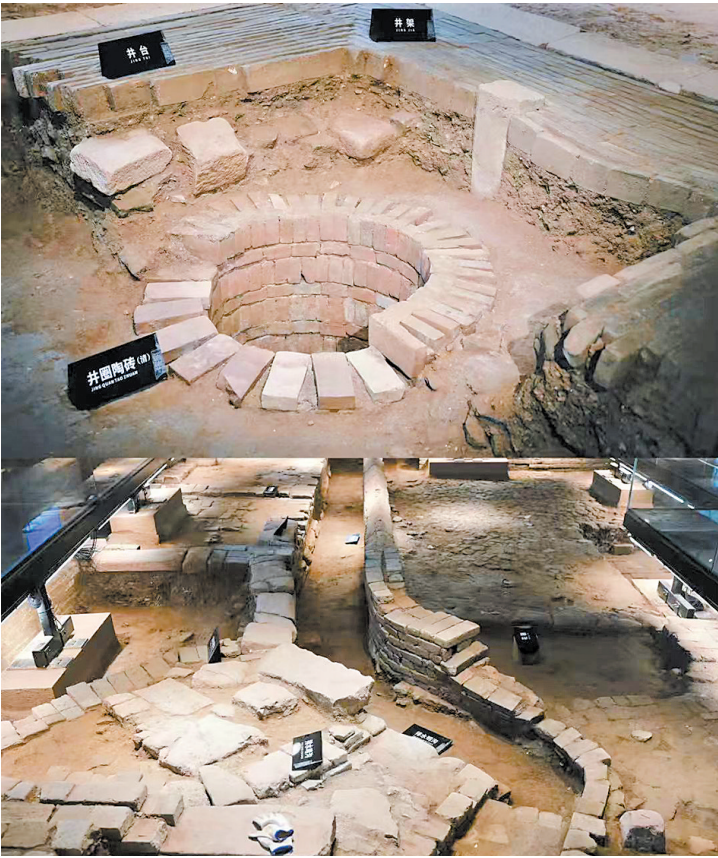
记者跟随钟馆长的脚步，从惠州城市“原点”出发，聆听他解读千年府城的文化密码及文保工作中的动人故事。

找到直观感知先祖生活的“历史窗口”

惠州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自古便是东江流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惠州大桥不远处，东江与西湖之间，有一座名为“棕山”的小山丘耸立，这是如今惠城区中山公园的所在地。此次普查新发现的代表性文物线索——惠州府衙遗址的核心区域便坐落于此。

隋开皇十一年(591年)，朝廷在今惠州棕山设立循州总管府，城市的肌理从这里展开。此后，历朝历代府衙多设于此，文脉绵延千余年未曾断绝。棕山成为惠州历史文化的“聚宝盆”，被誉为惠州“城脉原点”。北宋时期，苏东坡在棕山太守东堂(现中山公园内)饮酒品荔枝时，留下“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的名句，成为惠州广为人知的文化名片。

2021年春，为了配合中山公园升级改造同时对文物进行保护，惠州市文化部门委托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对



中山公园考古发现的棕井和府署花园遗址

中山公园进行了局部考古发掘并发现了惠州府衙遗址，同时进行三维数据扫描工作，最大限度地保存遗址信息。

这是广东省内除广州外第一次对古代官署建筑进行考古发掘的重大发现。“考古发现了多处明清建筑基址及史料记载的棕井等，还出土了一批遗物，有汉代的陶网坠，隋唐时期的板瓦、瓦当，宋代东平窑青釉瓷片等，是惠州城市科学考古的开端。”钟雪平介绍。

“惠州府衙遗址的发现对完善历史文化名城叙事体系、讲好惠州故事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场景。”钟雪平提及，2024年2月，在考古发掘的500平方米遗址上建成的“掀起历史一角”惠州府衙遗址展示馆正式开放，市民群众能透过这“一角”真切地触摸惠州千年历史。

在他看来，惠州府衙遗址及其周边环境整体呈现出文化遗产保护的原真性。“棕山及其周边区域为惠州市提供了一个直观感知先祖生活的历史窗口。”惠州府衙遗址周边的北门直街仍保留着惠州古城的风貌，不仅有明清古城墙、中山纪念堂、望野亭等文物古迹，还现出“官衙后街”的历史空间定位，还孕育了客家碱水粽制作技艺、惠州剪纸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因此在2020年入选广东省历史文化街区名单。

“这些历史遗存与惠州府衙遗址一同构成惠州城市的‘年轮’，以其原真性的城市生活圈延续着惠州城市文脉，是研究岭南城市营建史、建筑史的标本，也是维系老惠州人乡愁记忆的情感纽带。”钟雪平感慨。

“四普”成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活动

作为参与过两次全国文物普查的“老兵”，钟雪平对“四普”最深刻感触便是“全民参与保护机制”的实施。

“在我看来，文物普查是重新构建人与文物、空间关系的过程。作为国家层面的系统性工程，文物普查不仅关乎文化遗产保护，还会深刻影响社会各群体的文化认知。”为此，惠州市普查办邀请专家学者、市民、村民共同参与田野

作业，通过亲身实践唤醒保护意识。“这种沉浸式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他说。

钟雪平特别指出，不少市民主动提供文化遗址线索。“这使得文物普查从政府主导转变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活动。”

他介绍，在“四普”工作中，“村村到”是关键环节。“普查队员需要深入每个村落，向当地老人询问文物情况，边走边访了解文物相关的历史、传说和线索，丰富文物资料。”

以惠城区三栋镇木沥村元和村“寿山世居”的调查工作为例，他向记者介绍了专家村民与普查队协力在此调研的经过。正是经过他们的细致工作，认定这是一处与香港文化名人大营救密切相关的重要革命遗址。

寿山世居是惠州地区典型的方形客家围屋，为三开三进、中轴对称，麻石条锁边，青砖土砖墙、灰瓦民居建筑。该建筑目前已无人居住，周边遍植树木，植被茂盛。

钟雪平介绍，热心村民积极帮助普查队员们清理文物点周围的杂草树木，为测绘工作创造条件。曾在寿山世居住了20多年的村民李挺向普查队提供了史料线索：在抗战时期，寿山世居的李氏族人经营的“东和行”商铺与寿山世居都曾庇护过一批文化名人。

党史专家学者立刻根据村民的口述信息，结合惠州党史大事记等有关资料进行分析比对，证实确有其事：1941年底，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中共惠阳县委卢伟如等人根据周恩来指示，组织“香港文化名人大营救”，被救人员经宝安、秋长、三栋抵达惠州后，部分文化名人曾在寿山世居休整，随后分别入住水东街东湖旅店和寿山世居族人经营的“东和行”商铺。在普查队与村民、专家的通力协作下，遗址真容得以重现。寿山世居作为“四普”新发现，为研究惠州地区革命史提供了重要依据。

钟雪平表示：“全民参与文物保护机制的实施，不仅形成了强大的文物保护合力，确保了专业技术的严谨性，更在普查过程中唤醒了基层群众的文化自觉。”

一份“让过去照亮未来”的事业

在惠州市博物馆就职25年的钟雪平并非惠州本地人。家乡在河源的他自大学毕业后，就进入文化部门工作。

“说来惭愧，我对家乡的历史文化反关注并不多。”钟雪平坦言，“既然选择了惠州这片土地，走上文物保护

重现“带刺的红玫瑰”传奇

□陈开枝

运动，组织农民武装，在斗争中逐步成长，创建了五华革命根据地、八乡山革命根据地，成为党的地方负责人、东江革命根据地和东江红军创始人之一，成为中央统一指挥的红十一军军长。在战场上他冲锋在前，多次身负重伤；他爱兵如子，关爱群众；他作风民主，平易近人，善于团结同志。他党性强，把党的利益放在首位，以大局为重，忍辱负重，克服重重困难，带领红军战士和东江苏区人民，浴血奋战，牵制住了妄图进攻中央苏区的广东新军阀近十万大军，把东江革命根据地建成“中央苏区的南方屏障”。在十年的土地革命斗争中，在白色恐怖严重的情形之下，古大存生命不息、斗争不止，坚持十年红旗不倒。1934年中央红军长征之后，他与中央失去联系，依然坚持艰苦卓绝的斗争，最后带领仅剩的17名战士在东江的深山老林里继续战斗。

1964年，我大学毕业分配到中共广东省委，有幸在我十分崇拜的古大存同志身边工作，得到他的言传身教。毛主席曾称他是“带刺的红玫瑰”。如今，他那爱憎分明的性格、对同志亲如兄弟而令人爱戴的姿态，仍时不时浮现在我的眼前。

最近读了《红玫瑰》一书，又让我沉漫到当年古大存同志和东江红军



《红玫瑰》是党史文学作家王国梁创作的反映古大存军长在红色东江光荣历史的长篇纪实小说。

五华县是打铁打石之乡。当地有一句俗语，叫“硬打硬”。数年前，在古大存军长村子里立起一座十分生动的石雕塑，革命者的铁拳砸在反动派的头颅上，显示了当年农民勇于碰硬、砸烂万恶旧社会的震撼人心的光辉形象。

生于琴江畔的古大存，为庶母所生，童年备受欺凌，对旧世道的不公充满了仇恨。这方水土养育了他坚贞不屈、敢于同恶势力作斗争的勇气。五四运动的爱国主义思想熏陶了他，让他觉醒，加入革命洪流，在斗争中成为一名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他被党派去参加东征，参加农民

跨文体写作的无限可能

□赵立功



王福明最近出版了散文诗集《玄鸟归来》，是他多年来散文诗创作成果的小结。王福明是致力于散文诗创作和研究四十多年的散文诗大家。上世纪90年代初，他在散文诗相关研究专著中就散文诗是“美丽的混血儿”，揭示了散文诗的跨文体构成。

《玄鸟归来》收录了王福明多年来创作的300多首散文诗，近33万字，共分九辑和两个附录，虽数量巨大，却编辑清晰，归类合理，既化大为小地维持了散文诗单辑体量的轻巧，又便于读者就某一个主题进行集中阅读。书中所分各辑主题分明，基本是选用了每辑中一篇散文诗的题目，所选用的散文诗篇名又都能很好地涵盖本辑散文诗的意境和旨趣。

以往人们提到散文诗，总简单地把它看做是散文化了的诗，其构成仅是散文的形式、诗歌的灵魂。但综观《玄鸟归来》中的篇什，有些是生活散文，有些是历史文化散文，有些是山水美文，有些可以说是杂文，有些像电视脚本，有些以分行的酷似诗的形式出现，有些只是简短的哲思隽语。可以说，他以自己的写作实践让人们看到，散文诗作为一种跨文体写作在形式上似乎有无限的可能性。

通过《玄鸟归来》，可以看到散文诗作为一种体量轻巧的文体，也具有宏大叙事的可能。这种宏大一方面是篇幅无限放大的可能，另一方面是以轻灵的语言表达厚重思想和内容内容的可能。在

这方面，王福明以本书开卷之作、长达3000多字的《玄鸟归来》为人们提供了一个现成的文本。这篇散文诗长文，以四个板块的厚重、散文诗手法的轻灵，出入古今，把郑州这座省会城市从3600年前的殷商古都到21世纪的今天的发展历程娓娓道来，结构为一篇关于中原文化、城市历史的宏大散文诗叙事。

在王福明的散文诗里，无论写山水、人文，都随时能发现糅在那些短小篇章里的丰富的自然和人文历史知识，有些还是一般人平时不太留意的冷知识，读来会使人眼前一亮。他的语言和抒情都控制得极好，能融丰富的知识、深邃的哲思和深沉的感情于质厚简约，一读就懂却又耐人寻味，即便有所批评，也是点到为止，戛然而止的背后，留给人们巨大的思考空间。